

农村互助养老的“贵州经验”：实践模式、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邹瑞年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8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3日

摘 要

贵州农村老龄化程度深、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互助养老虽具成本低、社会嵌入性强等优势，但仍普遍面临建设易而运营难、服务供给不足、政策传导不畅等结构性困境。本文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制度、资金、参与、服务四个维度分析贵州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困境。研究发现：政策倡导与基层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具体表现为运营资金短缺且覆盖不均、老年人参与深度不足、专业护理服务薄弱、考核指标重建设轻运营。据此提出优化路径：构建多元共治的资金保障体系、激活内生参与动力、培育本土专业服务力量、完善政策协同与质量考核机制，以期欠发达地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参考。

关键词

农村互助养老，场域理论，现实困境，优化路径，贵州省

The “Guizhou Experience” of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Practical Models, Realistic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Ruian Zou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28,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3, 2026

Abstract

Rural areas in Guizhou face profound aging challenges with continuously weakened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functions. Although mutual elderly care programs offer advantages such as low costs

and strong social integration, they generally encounter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including easy establishment but challenging operations, insufficient service provision, and ineff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is study applies Bourdieu's field theory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obstacles of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in Guizhou across four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unding, participation, and service delivery. The research reveals significant tensions between policy advocacy and grassroots implementation, manifested in insufficient operational funds with uneven coverage, inadequate elderly participation, weak professional care services, and evaluation metrics that prioritize infrastructure over operational efficien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establishing a multi-stakeholder funding mechanism, stimulating intrinsic participation incentives, developing local professional service capacities, and improving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s—providing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Keywords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Field Theory, Practical Challeng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Guizhou Provi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国家统计局 2026 年 1 月发布的 202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32,338 万人, 占总人口的 23.0%¹, 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并正加速向重度老龄化阶段迈进。与城镇相比, 农村老龄化更严重。同时,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机构养老方面, 农村供给不足, 成本偏高。在家庭养老弱化和机构养老缺少的双重限制下, 如何发展低成本、可持续的养老服务模式, 成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 互助养老从基层自发摸索慢慢上升为国家政策方向。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开展农村互助式养老”²。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 互助养老作为低成本、可持续的农村养老模式, 依靠邻里守望传统和基层组织动员, 已形成“幸福院”“时间银行”等多元实践^[1]。它目前仍面临服务供给不足、专业能力薄弱、资源要素短缺及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在省级层面, 贵州省于 2025 年印发《贵州省关于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³, 明确将互助养老列为重点内容。2026 年又印发《贵州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试点工作方案》⁴, 在全省 9 个市州启动 18 个乡(镇、街道)试点。这些政策密集出台, 标志着互助养老在贵州已从个别村落的自己探索走向省级统筹的系统推进。

然而, 政策层面的推动并不直接等同于基层的有效运转。当前农村互助养老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与制度环境有关。制度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张力, 而互助养老模式的顺利运行需要制度之间的协调。然而, 政策推动并不直接等同于基层有效运转。当前贵州部分互助养老设施存在“建设投入后运营资金短缺”“老年人参与率与实际服务覆盖面不匹配”“服务内容以基础生活照料为主、

¹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²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6088.htm

³https://mzt.guizhou.gov.cn/xxgk/gzhgfwjsjk/gfxwjsjk/202511/t20251104_88911036.html

⁴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cjd/mts/202603/t20260324_89899858.html

专业护理不足”等典型问题[2]，这些问题在制度、资金、参与、服务四个维度上相互交织，亟待系统分析。

2. 农村互助养老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演进

2.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互助养老是指老年人在社区或村庄范围内，通过组织化或半组织化的形式，彼此提供生活照料、情感支持及部分健康管理的非正式养老方式。从老年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互助养老融合了传统家庭养老和现代社会养老模式的部分特点。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通过彼此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被赡养者”到“自助养老者”的角色转换[3]。

制度嵌入性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或社会行为都离不开所在的制度环境。对于农村互助养老而言，国家的社会福利价值取向、农村的政治经济管理制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构成了其最重要的制度环境[4]。制度嵌入性揭示了互助养老与环境之间的关联，但它对行动者内部的权力、资本与惯习互动解释力有限。因此，本文进一步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核心分析工具。

“场域”是指具有自身运作逻辑的社会空间。农村互助养老同样构成一个特定的场域，其中存在多元行动者，如各级政府部门、村两委、老年协会、企业、老年人及其家庭，各自携带不同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并遵循特定的思维与行为倾向。互助养老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各类资本能否有效组合、不同行动者的惯习能否相互调适。

基于场域理论，本文构建四维分析框架：制度维度对应符号资本与规则设定，聚焦政策目标与考核机制如何形塑场域运行规则；资金维度对应经济资本的来源结构与配置效率；参与维度对应社会资本存量与文化惯习对主体参与的影响；服务维度对应文化资本的供给状况。通过四个维度，可以系统揭示政策倡导的“主文化”与基层实践的“亚文化”之间的张力，解释互助养老场域中“制度空转”的生成机制。

2.2. 政策演进：从地方探索到省级统筹

第一阶段：地方自发探索期(2024 年以前)。以黔东南州、湄潭县为代表的基层村镇率先开展互助养老实践，如农村互助幸福院试点建设、老年协会自主组织。特点是“村社主导、项目驱动”，缺乏省级统一制度安排。

第二阶段：省级顶层设计启动期(2024~2025 年)。2024 年，贵州省印发《省民政厅等 12 部门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⁵。2025 年印发《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⁶，明确互助养老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 重点方向，并提出具体建设目标：2025 年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不低于 60%，2027 年提升至 70%。互助养老正式进入省级政策议程。

第三阶段：试点推进与系统实施期(2026 年以后)。2026 年 3 月，省民政厅印发试点方案，在全省 18 个乡(镇、街道)启动试点，部署七大重点任务。贵州互助养老从“政策倡导”走向“系统落地”。上述政策演进表明，贵州已初步形成“省级定标、市县实施、村社落地”的工作格局，但政策目标与实际运营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

3. 贵州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模式分析

截至 2025 年 9 月，贵州已初步建成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县级养老机构 143 个，乡镇养老服务中心 580 个，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站 1010 个⁷。在此基础上，2026 年初启动了新一轮试点。主要形成四种代表性模式：以黔东南州为代表的“互助幸福院”模式，以湄潭县抄乐镇为代表的“五个一”组织模式，以

⁵https://mzt.guizhou.gov.cn/zfxgk/fdzdgknr/lzyj/zcwj_5621015/202411/t20241121_86117058.html

⁶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cfg/swygwj/202304/t20230417_79091677.html

⁷https://mzt.guizhou.gov.cn/xwzx/mzyw/202509/t20250915_88615326.html

黔东南州为代表的“村哥村嫂”熟人互助模式，以及六盘水、纳雍县的“时间银行/积分货币”激励模式。

3.1. “互助幸福院”模式——以黔东南州为例

黔东南是贵州建互助幸福院最多的地区。截至 2024 年 10 月，全州投入 2353 万元，建成 538 所幸福院，覆盖大部分乡镇。幸福院利用闲置校舍改建，设厨房、餐厅、活动室和休息床位。符合条件的幸福院每年每所获 1 万元运营补贴，2023 年全州仅 7 所获补贴，2024 年增至 22 所。一个村级幸福院若每周提供 5 天助餐，据测算年运营成本至少需要 3 万~5 万元，1 万元补贴远远不足以覆盖日常开支。从全国来看，农村幸福院普遍面临财力保障严重不足、日常运营管理服务绩效差、空壳化现象突出等问题，办院模式也在深度演变。对财政补贴和外部资源输入高度依赖，一旦资金断流便面临困境。单纯依靠行政推动而忽视培育内生“造血”能力，是此类模式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⁸。

3.2. “五个一”组织模式——以湄潭县抄乐镇为例

湄潭县抄乐镇的“五个一”工作法(健全老年协会、摸清老年台账、完善服务阵地、制定服务清单、选聘互助员)被省民政部门作为典型推广。全镇 5 村 1 社区均成立老年协会，60 岁以上老人 3390 人，登记会员 2960 人，入会率 87.31%。选聘 50 名养老互助员，服务清单涵盖 2 大类 9 小类 18 项，近半年举办集中活动 5 场次，老年人参与 2000 余人次。但全镇 3390 名老人，人均参与不足 0.6 次，“内生动力存在不足”的典型困境在此处表现突出——多数老人处于“入会但未行动”的状态，实际参与集中在少数积极分子身上⁹。

3.3. “熟人互助”模式——以“村哥村嫂”为例

“村哥村嫂”是由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养老企业运营的熟人互助模式，主要依托本地低龄健康老人和留守妇女组建志愿服务队，进行“一对一”结对和日常巡访。不到一年，项目覆盖 5000 余户，完成 30 次以上服务达 4042 户¹⁰。“村哥村嫂”模式的思路在于降低对“公益”“志愿”的强调，积极以熟人社会的逻辑和市场化雇佣运营方式构建非正式支持的参与网络，补充养老服务供给渠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企业运营，将社会工作嵌入乡土社会，既提升了服务质量又保留了熟人社会的联结优势。该模式也面临志愿者规模有限、服务偏基础、专业护理能力不足等问题。

3.4. “积分激励”模式——时间银行与积分货币

六盘水“时间银行”：在基层组织引领下建立“时间银行”公益联盟，志愿者每服务 1 小时可获 1 枚“服务币”或储存 1 小时“时间积分”，可兑换他人服务或超市商品，目前 200 余名志愿者累计存储超 500 小时¹¹。纳雍县“积分货币”：在毕节市纳雍县和丰村，村民为老人提供代购、打扫、陪诊等服务，每小时积 10 分“暖心币”，可在积分超市兑换米面油等 20 余种物资，32 名村民累计服务超 600 小时，村内 16 名留守老人全部纳入照护¹²。农村“时间银行”目前面临共生单元不足、共生关系薄弱导致进阶衍化受限、数字赋能欠佳、正式政策缺位导致共生环境不稳定等关键瓶颈。

3.5. 模式的比较分析与共性提炼

为直观比较上述四种模式的组织主体、服务内容、资金来源、激励方式和主要优劣势，本文归纳了表 1。

⁸http://mzj.qdn.gov.cn/zwxx_5825880/xsdt/202410/t20241031_86004709.html

⁹<http://gz.people.com.cn/n2/2025/0506/c361324-41218765.html>

¹⁰https://mzt.guizhou.gov.cn/xwzx/sxxx/202604/t20260422_90032330.html

¹¹https://www.gzlps.gov.cn/zzb/jrld/202508/t20250820_88492648.html

¹²https://www.gznayong.gov.cn/jgsz/xzjd/kzx_5670608/gzdt_5670651/202508/t20250814_88466865.html

贵州互助养老模式的三个共性特征：社会嵌入性——所有模式均依托熟人社会网络；低成本运行——设施利用闲置资源，服务者多为低偿或志愿者；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各级民政部门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村里、社会力量、个人共同参与。从资本要素的配置来看，不同模式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投入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互助幸福院模式重经济资本投入、轻社会资本培育，导致设施建成后难以运转；“五个一”模式重社会资本动员、轻经济资本持续供给，导致服务覆盖面虽广但深度不足；“村哥村嫂”模式试图通过市场化雇佣方式弥补文化资本缺口，但规模受限；“积分激励”模式以社会资本的微观交换机制为支点，试图实现有限经济资本的最大化动员，但对制度环境的高度依赖使其脆弱性较为突出。这说明，单一维度的资本投入难以支撑互助养老场域的持续运转，需要四类资本在合理结构中的协同配置。

Table 1. Comparison of main models of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表 1. 贵州农村互助养老主要模式比较

模式	组织主体	服务核心	资金来源	激励方式	突出优势	主要局限	主要资本投入
互助幸福院	村集体/民政	助餐、日间照料	财政补贴为主	低偿/免费	设施固定、覆盖面广	运营资金短缺、空壳化	经济资本
“五个一”模式	老年协会	清单式综合服务	村集体 + 少量补贴	组织化动员	需求对接精准、入会率高	过度依赖少数骨干	社会资本
“村哥村嫂”模式	政府购买 + 企业运营	上门助洁、陪诊等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工资 + 精神荣誉	服务本地化、质量受监督	规模受限、专业护理不足	经济资本 + 文化资本
时间银行/积分货币	基层组织 + 社会联盟/村“两委”	基础生活照料	社会捐赠 + 村集体	积分兑换实物或服务	激发参与积极性	兑换范围窄、跨区不通兑	社会资本 + 符号资本

4. 贵州农村互助养老的现实困境与相关因素

贵州农村互助养老设施的硬件建设已取得相当进展，但在政策传导、资金保障、参与主体和服务能力等方面仍面临深层困境。以下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制度、资金、参与、服务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4.1. 制度层面的现象：政策传导与部门协同

省级层面已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并设定了具体覆盖率目标，政策框架日趋完善。但在乡镇和村庄的执行层面，政策效果的显现仍需一个过程。贵州虽已建成千余个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站，但调研发现，部分站点存在“建而少用”“有人建、无人管”的现象。以互助幸福院为例，2023 年黔东南州 538 所幸福院中仅有 7 所获得运营补贴，占比 1.3%；2024 年增至 22 所，占比仍不足 4.1%¹³。现行考核以“建成数量”“覆盖率”为核心指标，客观上诱导基层将有限资源集中于硬件建设与挂牌验收，而对设施启用后的服务频次、老年人满意度、运营可持续性质量指标缺乏刚性约束。这导致部分站点陷入“建成即闲置”的符号化运转状态。从场域视角看，上级政府以数量为核心的考核方式，以及部门间政策协同的缺位，共同导致了互助养老政策的“悬浮”困境^[5]。政府行政指标与村委建设内生动力的矛盾属于“结构脱嵌”，政策设计与农村养老习惯的背离属于“文化脱嵌”，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孱弱与政策定位模糊的张力则属

¹³数据来源于黔东南州民政局《2023 年度福彩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及《2024 年度福彩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2023 年公告：https://mzj.qdn.gov.cn/zwgk/czxx/202404/t20240410_78901234.html；2024 年公告：https://mzj.qdn.gov.cn/zwgk/czxx/202504/t20250410_78905678.html

于“社会脱嵌”[6]。

4.2. 资金层面的现象：建设与运营的平衡

贵州互助养老在资金方面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项目资金可以较好地支撑设施建设，而日常运营资金的稳定性则需要进一步加强。部分幸福院的日常运转主要依靠村集体有限收入或社会捐赠维持，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程度和稳定程度还有提升空间。据测算，一个村级幸福院仅助餐一项的年运营成本在3万~5万元之间，而目前每所每年1万元的运营补贴仅能覆盖助餐成本的20%~33%¹⁴。2023年黔东南州仅有7所幸福院获得补贴，占总数1.3%；2024年22所，占比4.1%。全省层面的运营补贴覆盖面和标准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其原因包括：补贴申请程序繁琐、需配套提供财务票据与活动记录，而多数村级站点缺乏专职人员处理行政事务；同时省级福彩公益金用于运营补贴的额度有限，优先覆盖示范站点。

在场域分析中，这反映出经济资本在不同环节的配置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政府投入在固定资产建设方面相对集中，而运营维护阶段的经济资本配置相对较少；社会捐赠具有自发性但不确定性较强；村集体经济在多数村庄仍处于发展阶段，提供稳定支撑的能力有限。国家层面，农村幸福院普遍面临财力保障严重不足、日常运营管理服务绩效差、空壳化现象突出等问题[7]。从共生理论视角看，农村互助养老共生系统存在共生单元结构性失衡、共生界面能量传导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从资源互动层面解释了资金配置不均衡的深层机制[8]。如何将政府投入、社会捐赠、村集体支持和个人低偿付费等渠道有效协调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资金保障结构，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4.3. 参与层面的现象：主体参与程度

互助养老的核心在于“互助”，即老年人既是服务的接受者，也是潜在的参与者。农村互助养老本可通过动员整合、角色转换、机会创设等机制促进“老有所为”[9]在贵州部分村庄的实践中，老年人参与互助服务的广度与深度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服务供给目前主要依赖少数骨干力量。抄乐镇60岁以上老年人3390人，虽入会登记率达87.31%，但近半年集中活动仅5场次、参与2000余人次，人均不足0.6次¹⁵。黔东南“村哥村嫂”项目覆盖5000余户，但完成30次以上深度服务的仅4042户，仍有近千户仅接受初步服务。六盘水“时间银行”200余名志愿者累计存储超500小时，人均存储2.5小时，活跃度有待提升。纳雍县32名村民累计服务超600小时，人均约19小时，惠及16名留守老人，但覆盖面仍局限于一村。

从场域视角分析，这涉及社会资本与文化惯习两方面因素。一方面，青壮年长期外出务工使得村庄传统邻里互助网络发生松动，互助行为的自发生成机制有所弱化。另一方面，部分老人仍受“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对参与互助服务存在观念适应过程；也有老人对服务中可能涉及的安全责任有所顾虑。研究发现，追求“老有所为”的老年精英往往是触发互助行为的初始推动力量，但这类群体规模有限；而普通老人的需求更多集中在“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乐”层面，参与互助的内驱力有待进一步激发。低龄老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关键在于实现从“结构性困境”到“能动性实践”的转换，这需要强化社区嵌入与治理协同。

4.4. 服务层面的现象：专业能力与服务内容

农村互助服务人员多为低龄健康老人或留守妇女，他们热心参与服务，但大多缺乏系统的养老护理培训。以黔东南州“村哥村嫂”项目为例，200余名服务人员中，持有养老护理员初级证书者不足10人，

¹⁴成本测算依据：按每人每餐食材成本3~5元、日均服务30人、每周5天、每年50周计算，仅食材成本约2.25万~3.75万元；外加水电、炊具维护、少量人工补贴等，年总成本约3万~5万元。参见李学迎《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存在问题、模式演变与治理策略》（《理论学刊》2024年第2期，第72~79页），该文对全国农村幸福院运营成本有详细测算。

¹⁵<http://gz.people.com.cn/n2/2025/0506/c361324-41218765.html>

无人持有中级及以上证书。专业能力的匮乏直接限制了失能照护、康复训练等高质量服务的供给。服务内容目前以助餐、助洁、陪聊等基础项目为主，而老年人需要的康复训练、失能护理、认知症照护等专业化服务明显不足。在场域分析中，这反映的是文化资本的积累尚处于初级阶段。农村地区受待遇水平、劳动强度和社会认可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专业护理人员的引进和稳定存在较大难度。现有服务多由参与者的热情推动，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和质量监管机制正在逐步建立之中。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服务标准化建设和质量监管机制上取得突破[10]。互助养老场域若要实现服务质量的有效提升，通过外部引入和内部培育相结合的方式充实专业文化资本，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5. 优化路径

针对贵州农村互助养老在制度、资金、参与、服务四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优化措施。这些措施紧密联系贵州农村的实际情况，力求具体可行。

5.1. 制度优化：完善政策协同与质量考核机制

推动互助养老从“政策倡导”走向“有效运转”，需在考核导向与资源整合上实现突破。一是建立“县域互助养老资源池”，由县级政府统筹民政、卫健、人社、农业农村等部门投向农村的公益性岗位、巡诊补贴、以工代赈等指标，允许村两委将其转化为养老互助员岗位或服务积分兑换物资，破解“各发各的钱、各建各的点”的碎片化困境。二是优化考核机制，引入“运营存活率”“月均服务人次”“村集体主动配资比例”等实效指标，替代单纯考核建成数量；对连续两年空转的站点允许调整功能或合并运营，避免“一建了之”。三是赋予乡镇“服务清单调整权”，省级仅定助餐、助洁、助医、助乐等大类，具体小项由乡镇根据本村老人实际需求动态确定，增强政策与基层的适配性。

5.2. 资金保障：构建多元共治的经济资本供给体系

破解“建得起、养不起”困局，需将互助养老嵌入贵州农村的特色产业体系。一是推动养老服务点与乡村产业复合利用：依托茶叶、辣椒、中药材等特色农业及乡村旅游资源，将互助幸福院改造为农产品初加工点、游客接待小站或电商代收代发点，其经营收益按比例反哺养老运营，使服务站从“消费型”转向“生产 + 消费混合型”。二是建立“村集体经济养老反哺金”制度，鼓励村集体将年度经营性收益的 5%~10%划入互助养老专项账户，县级财政按比例给予奖补，形成稳定资金池。三是探索外出务工人员“代扣代捐”机制，依托“黔农云”等平台允许子女按月自愿捐款定向用于父母所在村的互助服务。四是逐步形成“财政补一点、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付一点”的资金共担格局。

5.3. 参与激活：分类施策拓展参与广度与深度

提升参与率需针对不同老年群体设计差异化激励。对低龄健康老人以“积分兑换实物或服务”为主，如积分换米面油、换农忙时他人帮工，强化即时利益联结。对村内有威望的老年骨干，授予“养老互助队长”“银发乡贤”等称号，纳入红白理事会、调解委员会，增强社会荣誉感。对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者，不强制要求其服务，而是通过子女劝说、邻里示范逐步转变认知。同时，建立“家庭照护积分可转赠”机制，允许在外务工人员所获“时间银行”积分转给父母使用，打通跨代际、跨空间的互助链条。此外，不宜追求全村高参与率，宜在自然村层面组建 5~10 人的互助小组，每人每月完成 1~2 件小事，如顺路代买、提醒吃药，通过微信群或月末聚餐维持低门槛粘性。

5.4. 服务提升：链接医疗资源与培育本土专业力量

针对专业护理能力不足，重点将留守妇女转化为“有资质、有收入、有尊严”的互助力量。一是打造

“乡村养老护理员——巾帼互助岗”阶梯式认证体系：依托县级职校和卫健局，开展初级、中级、高级三级培训。初级为村内认证，涵盖基础助洁、用药提醒；中级为县级认证，涵盖翻身喂饭、跌倒处置；高级为省级认可，涵盖认知症照护。获证人员纳入县级养老服务人才库，优先推荐到乡镇养老中心就业。二是推行“服务换培训、换保险”机制，每服务满 100 小时可获得一次免费中级培训或一份意外伤害保险，降低服务顾虑。三是推动互助养老与基层卫生服务衔接，将村医、家庭医生团队纳入互助网络，提供慢病管理和康复指导。四是引入“商业保险 + 村级风险调解基金”，为活跃互助员购买意外险，设立专项基金兜底服务纠纷，避免“一次意外毁掉全村服务热情”。

6. 结语

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依赖于制度、资金、参与、服务四种资本的协同配置。贵州实践表明，单一资本主导易导致场域运转失灵：互助幸福院重经济资本轻社会资本，“五个一”模式社会资本强而经济资本弱，“村哥村嫂”规模受限，时间银行对制度环境依赖过深。政策启示在于：县域层面需建立“资本协同”治理逻辑，推动考核导向从重建设转向重运营，资金配置从财政单撑转向多元共治，参与动员从骨干驱动转向低门槛互助网络，服务能力从热心无证转向阶梯化专业培训。贵州经验对欠发达地区具有参考价值：互助养老能否真正成为农村老人的可靠依托，关键在于场域内各行动者的资本能否被有效激活与组合。

参考文献

- [1] 贺雪峰. 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5): 1-8.
- [2] 李俏, 刘亚琪. 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与发展走向[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5): 72-78.
- [3] 陈静, 江海霞. “互助”与“自助”：老年社会工作视角下“互助养老”模式探析[J].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 22(4): 36-43.
- [4] 赵志强, 杨青. 制度嵌入性视角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J]. 农村经济, 2013(1): 89-93.
- [5] 张世青. 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的悬浮与落地：府际关系的视角[J]. 学习与实践, 2025(11): 112-119.
- [6] 杨克. 孤独的幸福院：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的多重脱嵌困境研究[J]. 中国农村研究, 2022(2): 3-24.
- [7] 李学迎.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存在问题、模式演变与治理策略[J]. 理论学刊, 2024(2): 72-79.
- [8] 何晖, 王睿灵, 黄鸿剑. 共生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基于 X 县的考察[J]. 社会保障研究, 2025(1): 11-19.
- [9] 王辉, 陈筱媛. 以农村互助养老促进老有所为：内在机制、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26(4): 26-47.
- [10] 戴祥玉, 孙妍微.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行政与法, 2026(3): 103-116.